

石狮

王镇辉 蔡德奇 / 主编

大变迁与新趋势



福建人民出版社

序

林子力

最近,我刚从国外考察归来,就收到了王镇辉、蔡德奇两位同志从福建寄来的书稿:《石狮:大变迁与新趋势》。细读之后,感到作者付出了大量心血,花费了许多劳动,研究成果确有相当深度。

在我印象中,有关石狮的各类研究文章虽已有不少,但像这样从文化、经济、政治、社会结构等多侧面进行综合性的研究,还是第一次。石狮在十几年内由一个贫穷的乡村小镇,变成今天这样繁华昌盛、颇具经济实力的城市,成为我国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带的一个缩影,对之进行这样的综合性研究,确如作者所说:有意义、有必要。对石狮进行综合性、多方面的研究,如果抓中心、抓主线,那么这个主线就是在国家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这个大背景、大环境下,石狮的市场经济一往无前、迅速发展过程。石狮的发展充分证明,对于传统的计划体制、传统的思想观念,谁摆脱得彻底,谁就发展得快。石狮、温州等我国著名的商品经济发达的地方,实际上就是摆脱传统体制束缚最为彻底的地方。

固然,石狮发展中有其独特的优势,如:那里是著名的侨乡,侨资在石狮的资本初始积累中起了重要作用。但正如作者所指出的,石狮并不只靠这种优势,并不是仅吃这些“老本”的。石狮文化与国内其他很多地方不同:石狮人不中庸,不自欺欺人,敢当出头鸟,敢打敢拼,“输人不输阵”,屡遭打击、挫折,仍不屈不挠地发展市场经济,即使在计划经济高度封闭的顶峰时期,在“文化大革命”极“左”的大棒严厉剔除中,即使被戴上了种种骇人的帽子,石狮人仍然选择了、认准了一条路,那就是走向市场。正是这种早期充满政治风

险、后来充满经济风险的路，锤炼出了石狮众多的企业家，才积累了今天这样多的财富。可以说，我国近年来托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体制确立的福气而发达致富的诸多地方，很少有像石狮这样饱经风霜、这样对市场经济理解得透彻的。石狮确实是个典型，如果作为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带的缩影，确实引人深思。它告诉我们，义无反顾地走出传统的、旧的经济模式，在中国这个古老的土地上卷起竞争的狂风，千帆竞发，就有光明的前途。反之，正如我国内地还有不少地方，传统体制尚未退出历史舞台，向市场经济转轨有的甚至才刚刚起步，这些地方怎样摆脱贫困、怎样实现温饱都是严峻的问题。这些地方，正应该充分借鉴石狮、温州等地市场发展中的“先流通后交通”“先放开后管理”“先繁荣后疏导”“先发展后规范”等等精彩篇章，因为这些才能使经济迅速发展起来。这些正是石狮发展的灵魂。

作为中国市场经济的先行者、成功者，石狮的发展除了对别的地方有借鉴意义之外，其本身怎样面向未来、面向 21 世纪更大踏步地向现代化发展，也需要认真地思索。迈向现代化，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共同之路，其中的发展规律，不可不察。根据我的长期观察和研究，我认为人类经济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是，在经过漫长的产品和劳动社会化的过程之后，更高的发展是财产权利社会化。产权社会化是现代发达的市场经济的标志。在全世界市场经济发达的地区、国家，产权社会化作为一种趋势已越来越普遍，越来越明显。产权社会化的突出特征或者说核心在于，财产的所有者越来越趋向不再干预财产的支配或经营，原来的所有权转化为取得产权转让价格或产权收入的权利。在发达的现代市场经济中，财产无论归谁所有，都可以为社会所支配和使用，即人们可以凭借其才能在支付产权价格的条件下，获得财产的支配、使用权；产权价格，就像产品价格、劳动价格一样，成为一种机制，即导致社会物质资源

有效配置的机制。产权社会化,将使传统的所有制决定论、所有者优先论,即“所有者的经济学”固有的深刻缺陷显露出来。在我国,由于市场体系还未健全,各种市场要素还未发育充分,竞争、法制都还不完备等等,“所有者的经济学”、财产权利的封闭性也还随处可见。但是,历史的趋势、经济发展的自然过程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

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趋势,我们不妨把视野放宽,看一下世界。目前在世界许多地方,正在发生的新技术革命,特别是以计算机技术为首的信息革命,正以极快的速度、极广的范围、极深的影响在传播。信息革命的速度、规模和力度已远远超出了当年的工业革命,并且比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曾有过的一些发达国家经济迅速起飞的速度也快得多,真可谓日新月异。目前信息产业已超过了石化工业和汽车工业,成为世界第一大产业,这一趋势促进了经济全球化,对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正在进行着深刻的重塑和改造。信息革命,正是产权社会化的发展,其中有的本身就是产权社会化的高级形态。它有力地证明了在现代市场中,财产归谁所有并不重要,使用方式、支配方式即经营方式才最重要这一事实。信息革命等高新技术的发展,使传统的所有制经济学或所有者经济学失效了,许多传统的经济学概念都受到了挑战。在发达国家,这样的事实已屡见不鲜:一个所有者有几千万美元,但他不懂经营,在信息革命产生的巨大而复杂的商海中,千万资产转瞬即逝。在人们的日常生活、普通商业往来中,无数的适应新技术革命的高科技知识的掌握者,也就是诸多使用、支配所有者的财产的“经营者”,走上了经济全球化这个竞争的历史舞台。

信息革命中的竞争,没有硝烟,无声无息,但却非同小可。比如信息技术的全球化,有可能使地方文化出现萎缩,几百种语言将消失。有人甚至判断,目前全世界的几千种语言,到下个世纪将有大部

分消失。又如作为商人，千辛万苦地筹备展销会这种形式将越来越多地被信息技术所代替，计算机屏幕上显示的世界各地的产品，从样式到行情都将形成一个随时提供给需要者的巨大的“展销会”。信息技术将使世界各个地方出现新的贫富差别，其表现形式已与传统的贫富差别不同；比如在金融领域，电子银行业越来越全球化，人们就会利用网络了解世界各地存款或取款的一些差别，寻找更高的汇率或利率等。有人还指出，计算机如果能击败国际象棋的世界冠军（今天的超级计算机已可以每秒运算 600 亿次），那么计算机在瞬息万变的股市、商品交易所、共同基金交易所中作出决定，也只是早晚的事情。正因为如此等等，美国放弃了星球大战的计划，欧洲放弃了“尤里卡”计划，许多国家已意识到了在这场竞争中落后的可悲后果。在这场竞争中，连号称电子巨人的日本也已落在了欧美后面。这不是由于欧美比日本对信息革命的重要性和威力更有危机感，恐怕还是要从体制、文化等方面找原因。当然，日本有发达的市场体系，有科技基础，它在信息革命中也不会自甘落后的。

信息革命，也就是信息技术的飞跃发展。信息技术中最突出的是数字技术。而在数字等科学技术的竞争中，我们中国人、中华民族自古就有优势。在现在的信息革命面前，我们民族又有了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中国的信息技术人才如果培育得法，可以成批出现。在经济全球化的竞争中，中国人是不会落后和吃亏的。勇于参加这个信息革命全球化的进程，会给中华民族带来巨大利益。

石狮、泉州、温州这些我国东南沿海先发达起来的地方，再发展，就要有更高更宽更远的眼光。远的发达国家不说，近的就说所谓亚洲几小龙吧，香港、台湾地区，新加坡、韩国，新近又有了泰国、马来西亚，都没有在电子技术、信息革命的发展面前显出迟疑，而是奋勇争先。香港、台湾地区和韩国的电子产品、高科技发展一直

是最受关注的产业。在石狮的面向 21 世纪的远景规划中,我注意到了两点:一是到 2000 年,石狮产品中的科技含量要达到 50%;二是石狮赖以起家的支柱产业——服装行业,从劳动密集和低附加值转向高档化,要引进国际先进技术,建设中国服装城,建设高档服装面料鞋料生产基地、服装加工生产基地、服装及原辅材料批发中心、世界服装及面料流行趋势信息发布交流中心、中国服装名牌贸易中心、中国服装高科技促进发展中心等等。这些设想、思路无疑都是正确的,但是在具体实施中,要注意什么? 2000 年离现在只有几年了,就是到下世纪初,也不远了。要实现高科技含量在产品中的大幅增加,要想及时掌握世界范围的商品信息,比如服装,不掌握巴黎、意大利、纽约等地的商品信息,当然不能在世界服装市场上叱咤风云,但是身在石狮这个世界眼里的弹丸之地,怎样掌握那么远地方的商品信息呢?看来除了密切关注信息技术的发展,别无他途。这方面基础设施的投资、人才的培养以及其他方面的未雨绸缪,都应该早早开始。因为在 21 世纪的商战中,信息失败就是完全的失败。目前我国沿海发达地区的信息产业投资速度在加快,上海自不用说,广东珠江三角洲、深圳、珠海有近临香港之利,也在密切关注信息产业的发展。泉州、石狮等地怎么办呢?也许还是可以在“侨”字上做文章。目前在新加坡,已有华侨总商会开始筹建世界商品信息联网,而新、马、非等地的石狮籍华侨很多,吸引他们为家乡投资是重要方面,更重要的是通过他们真正加入经济全球化,和他们站在同样水平的起跑线上,才有可能使石狮产生更多的郑周敏式的著名实业家。对石狮的研究还有广阔的空间,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上进行不断的探索。

1996 年 6 月 9 日·北京

目 录

SHISHI DABIANQIAN YU XINQUSHI

●序 林子力(1)

◆历史文化背景与石狮人的性格 (1)

◆民间资本推动下的经济成长方式 (31)

◆自由企业制度 (85)

◆经济结构转换 (137)

◆市场体系 (163)

◆变迁中的社会结构 (189)

◆走向市场经济的政治秩序 (217)

◆农村城市化 (251)

◆迈向现代文明 (301)

●附 录

开展第二次创业,营造跨世纪优势,把石狮建设
成为闽东南繁荣带上的现代文明城市

..... 何锦龙(339)

石狮市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
2010年规划纲要 (347)

●后 记 (369)



大变迁与新趋势

历史文化背景与
石狮人的性格

文化作为一个社区人群独特的生存方式，千年演化，在石狮形成了一种具有很强吸附性和容纳性的文化发展机制。

石狮文化铸造了石狮人的性格。

他们乐天，不拘泥于小事；他们富于进取精神，不愿受他人支配；他们具有非常的耐心和坚韧不拔的意志，是可怕的商界对手；他们认为“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坚信“爱拼才会赢”。

改革开放以来石狮经济发展的速度令人瞩目,引起了学者们的特别关注,被当作一种“模式”或“现象”进行研究。纵观有关的研究文章,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在注重分析经济本身的因素(主要是投资及资金的形成)在石狮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同时,都开始注意到了非经济因素,尤其是文化因素的作用。这一点无疑是很有见地的。

一、文化背景:石狮研究的一个新起点

任何一种具有自己特色的经济发展类型的出现,总与该地区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紧密相关。离开了非经济因素的分析,我们很难理解像石狮、温州这样的地方,市场经济为什么会发展的这样迅速。但,迄今为止,把石狮文化与石狮经济联系起来进行系统研究的文章,似乎还未见到。无疑,这是今后“石狮现象”研究中需要加强的一个方面。

“结构功能主义”的代表人物帕森斯(Parsons),在其名著《社会行动体系》中,对文化在整个社会体系中的功能有过精辟论述。他把社会大系统分为四个子系统,这四个子系统分别为:(1)负责调适的子系统(Subsystem of adaptation), (2)负责实现目标的子系统(Subsystem of goal—attainment), (3)负责整合的子系统(Subsystem of integration), (4)负责维持模式的子系统(Subsystem of pattern—maintenance)。就整个社会而言,任何社会都有一个基本问题,即如何与外界环境调适,这是关系到个体与社会生存的根本问题。每个社会都会有一套特定的方式来应付和控制外界的环境。在帕森斯看来,经济系统即属此类,它是社会成员们设计

出来,对各种经济资源进行有效配置,以维持基本生存的方式。同时,人是有动机的,社会也一样,每个社会都会形成共同意识,因此,为应付不时产生的动机,社会中就要有一套特定的系统以便来达到预期的目标,帕森斯认为,政治系统即承担这种功能。但是,由于任何社会都有相当程度的分化,现代社会尤其如此,分化的结果,使得社会成员之间可能在利益、信仰、态度、价值等方面产生分歧,为维持社会的共存状态,就要有一套特定的系统来负责,这方面的因素固然很多,但其中有一个现象可以说是主要原因,那就是,在任何社会形态中,都有“社区”(Community)形态的存在。所谓“社区”,这里必须做最广泛的解释,“它是一种超乎单纯地域性社区外的东西,它包含着高度的个人亲密性、情绪投入、道德认同、社会凝聚,而且在时间上有延续性的所有关系形式。”因此,“社区”即是一个负责社会整合的子系统。然而,在帕森斯看来,不管是与外界环境的调适,或目标的实现,或社会的整合,基本上都是人类意识活动的结果,也都是社会成员的创造品,它们都必须通过人类赋予特定意义,而以特定的形式来表现。即是说,无论生产模式、经济体制、政治制度或社区形态,最终都必须接受人的意识的指导,而反映人类的某种理念、信仰和价值。换句话说,在人类社会中,我们可以看见有一套的制度来规范、修饰和发展理念、信仰、态度与价值。这种制度往往自成体系,帕森斯称之为“文化系统”,文化系统具有使一个社会形成并维持其独特性格的作用。中国社会之所以呈现成中国式的样子,即因中国人有其独特的文化传统体系。同样,我们可以说,石狮之所以会形成独特的经济发展类型,即因石狮具有其自己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

关于文化因素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韦伯(Max weber)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阐述最为充分,影响也最大。他认为,资本主义之所以首先在欧洲兴起,是因为欧洲人具有一种相当特

殊的成就动机。这种动机内涵在欧洲历史之中,基督新教伦理即是促发这种动机的历史原动力。他还认为,中国传统社会之所以未能发展出资本主义,很重要的一点是由于儒家思想与基督教伦理的区别。“儒家的理性主义是对世界的合理调适,基督教的理性主义则是合理地宰制世界”。由于儒家着重与自然的和谐,讲天人合一,讲修己顺天,所以不能引出对社会经济秩序的激烈变革的心态,这与控制自然、改造自然的经济发展的要求当然是不相符的。当然,传统中国人缺乏的其实并不是“成就动机”,问题在于其成就动机是偏于“人事学问”,是对儒家经典的掌握,是一窝蜂地往官场中挤。从这方面讲,韦伯的观念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但我们在同意韦伯基本观点的同时,不要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如此之大,地域之间不仅经济发展极不平衡,而且文化发展及人的性格发展也是极不平衡的。在中国经济与文化的发展都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性,即是说,每个地方都可能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文化系统与个性系统。这一点,古人早有论述。“邹人东近沂泗,多质实;南近滕鱼,多豪侠;西近济宁,多洋华;北近滋曲,多俭啬”(《邹县志》)。“吾郡少平原旷野,依山而居,商贾东西行营于外,以就口食。然生民得山之气,质重矜气节,虽为贾者,咸近士风”(《戴震文集》卷十二)。这些讲的是因自然条件不同而影响到人的性格的差异。“蕲春人性躁动,风气果决,包藏祸害,视死如归,此则其旧风也。自平陈之后,其俗颇变,尚淳质,好俭约,丧纪婚姻,率渐于礼”(《隋书·地理志》)。“新安名姓聚而居,绝无一杂姓渗入者,其风最为近左,出入齿让,姓名有宗祠统之,岁月优腊,一姓村甲,千丁皆集,祭用朱文公家礼,彬彬态度”(赵吉士《寄园寄所寄》卷十二)。这些讲的则是社会制度对区域文化的影响。“古今说笔,有时代性,山川浑厚,有民族性”,黄宾虹先生在其《九十杂述》中一语道破了中国文化的时空特色。因此,我们所讲的中国文化,并不

是毫无差异的铁板一块,而是由色彩斑斓的文化子系统构成的。我们以为要真正地认识中国文化这一独特的系统,除了宏观的理论研究之外,目前更需脚踏实地的实证研究。只有在宏观与微观的结合中深入考察与思考,中国文化的研究才能有新的突破。在实证研究中,地域文化应成为一个重点,尤其是地域文化与地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应是当前文化学与经济学研究中最具挑战性的一个问题,这也是我们在研究石狮社会经济发展类型中首先要面对的一个问题。

在具体研究石狮历史文化特性之前,我们首先有必要对文化的涵义进行一下界定。在现代社会科学中,文化是一个最常挂在人们口中,但也是用得最为松弛而混乱的一个概念。有人做过统计,从1871年至今,关于文化的不同定义不下200种。泰勒(Tylor)1871年首次对文化进行界定:“文化是一个复合的整体,其中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任何其他的能力和习惯。”这个界定大体已涵盖了文化的基本内涵。即是说,所谓“文化”,是指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一个社会中的成员所共同创造出的设计,它既包括有形的也包括无形的,实际上它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其一是属于行为的模式,其一是属于引导行为的模式。就前者来说,文化是指可观察的事件或事物,而具体的行为表现是其中最为明显的内容;就后者而言,文化是指具体的知识、信仰、价值或态度,它是社会成员藉以规范行为的模式并最终孕育选择的依据。美国哈佛大学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教授克鲁克洪(Kluckhohn)对文化作了更通俗易懂的定义:“文化是历史上所创造的存在式样的系统,既包括显型式样又包括隐型式样;它具有为整个群体共享的倾向,或是在一定时期中为群体的特定部分所共享。”(见克鲁克洪的《文化研究》)。也就是说,所谓“一种文化”,它指的是某个人类群体独特的生活方式,他们整套的“生存式样”。

由此看来,文化是一个抽象的复合概念。在本文中,我们为了牢牢把握讨论的重点,不使讨论流于空泛,同时兼顾本研究的主题,我们还要对讨论的“文化”内涵略加囿限。同时,要对我们的研究方法略加说明。既然本课题是有关石狮历史文化特性的问题,本质上即是一种经验性的研究。既是经验性的研究,自然要涉及到经验资料的收集,写作也要以经验资料为依据,否则,信度与效度无法确定。但囿于篇幅,我们无法(事实上也不可能)对体现在石狮社会中种种日常可见的行为模式、生活设计一一加以罗列讨论,因此,我们不打算把重点放在事实的描述,而是放在现象的内涵意义及其发生条件的解析。对一个社会学家而言,个人的动机固然是研究意向必须要关照到的,但他所关心的却不是一个个人的个别意向,而是体现在一个特定时空下一群人的意向倾向与其历史的变化。要对石狮人之意向倾向或生存式样有所了解,则不能不从其历史背景分析起。在具体的方法策略上,我们基本上依循韦伯(weber)之理想型(ideal type)的历史研究策略,于历史之中,选取一些特定的表征,加以夸张理想化,由此提出能用来代表石狮文化的概念来,在此基础上,概括出在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石狮人的性格。至于条件的因果分析,我们往往讲的是“充分”的而非“必要”的条件。同时,当我们选择“条件”时,也尽可能以拟情的方式来推论实际行动者的意向,以此做为解释现象的基础。不管如何,本文对石狮文化的解析只是初步的尝试,许多命题应当只具有概率的性质,有些甚至只能看作是一种假设性的陈述,恰当与否,还有待于石狮经济与社会发展经验的进一步证实,也有待于学者的进一步探讨。

二、石狮文化：四个子系统有机组合成的工商文化体系

前面已经分析，文化归根结底，是一个社区的人群在长期的生存活动中所形成的一套生存式样。依此，许多学者把文化划分成三大类型，即游牧文化、农耕文化和工商文化（又称为海洋文化）。在数千年的历史中，中国是一个农耕文化占绝对优势的社会，但这并不能否认游牧文化（如北部与西部地区的少数民族）与工商文化在中国的存在。近年来的研究，学者们大多倾向于将石狮文化归入工商文化之列。无疑，这与石狮独特的地理位置、自然资源、社会结构等诸多因素有关，是石狮人在生存困惑中的一种必然选择。下面，我们就从历史的角度，对石狮的海港经济、私商传统、华侨社会、家族制度的变迁情况进行一下回顾。可以这么说，这种回顾是解开石狮文化，同时也是解开石狮之迷的钥匙。

（一）海港经济

就目前而言，石狮其实并不能称作一个港口城市。那么，其港口经济及港口文化又是怎么形成的呢？这必须从泉州的历史，以及泉州与石狮地区的关系讲起。石狮成为一个城市，不过才几年时间，如果离开了石狮的“母体”——小概念指晋江，更大点讲的是泉州，我们将根本无法理解石狮，更不要说石狮的文化。

泉州海港最早形成于南北朝时期。其最辉煌的时代，是在公元12—14世纪的南宋和元朝。当时的泉州，是世界最大的港口之一。根据厦门大学庄为玳教授的研究，古泉州港并非特指后渚这样一个单一的港口，而是指一个港口群，即由泉州湾、深沪湾和围头湾等三湾中的十二个支港组成，其中包括现今石狮市管辖的蚶江、石

湖、永宁、祥芝四港。因此,在历史上,石狮地区是泉州港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点是无疑的。

在以农耕经济为主体的封建社会,由于自然环境与社会结构的原因泉州沿海地区很早就形成了其港口经济的特征。从泉州的地形图上我们可以看出,泉州背山靠海,平原狭小,耕地有限,港湾众多,发展农业经济的条件较差,而对发展海外贸易十分有利。从社会结构来看,继晋代中原人民大量南迁之后,自唐末五代,中原人口再度南移,致使泉州人均耕地开始减少,形成人与土地的矛盾。泉州史家王四达先生根据乾隆版《泉州府志》中有关人口和田赋的资料,对此做过专门的研究。唐开元年间,泉州共有 37000 户,若以每户 3 人计算,泉州地区人口已超过 10 万人,按唐朝均田制算,一户一顷耕地,当时泉州应有田地 37000 顷,可是直到清朝前期,泉州耕地只有 14000 顷。即是说,泉州地区人多地少问题实际上在一千多年前就出现了。自唐以后,福建人口随经济开发而急剧增多,到北宋元丰年(1078—1085)间,泉州人口已超过 20 万户,南宋后期已上升到 25 万户,即使当时耕地有所增加,但可以认定,人与耕地的矛盾已更趋尖锐,粮食已经无法实现自给自足,“虽当上熟仅及半年”,“专仰南北之商转贩给以自给”。宋代诗人谢履曾在一首诗中写道:“泉州民稠山谷瘠,虽欲就耕天地辟,州南有海浩无边,每岁造舟通异域”。这清楚地表明宋代泉州单靠耕地(农业)已无法满足泉州人吃饭的问题,也无法容纳全体劳力的就业。突破单一的农业经济的圈子,在当时已成为一个现实的问题。

当然,宋元时期泉州海港经济的形成,还与当时的中国乃至世界发展的大背景有关。从东晋南朝始,我国的经济重心开始南移,进入唐代,由于西域一带经常发生战争,特别是安史之乱,使北方中外经济联系受到严重影响,南方经济迅速发展。与此同时,从国际贸易背景看,世界海上贸易开始兴起,阿拉伯商人开始从印度洋

来到太平洋开拓市场，触角已伸到我国东南沿海各港口，因此，北方“陆上丝绸之路”逐渐被南方“海上丝绸之路”所取代。泉州地区由于偏安一隅，战乱较少，加上唐、宋、元等朝代对航海通商都采取鼓励政策，因而发展成为南方的重要商港，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

农业经济的危机与海上贸易的兴起，逐渐改变了泉州地区的社会经济结构。近年来大量研究已经证明，自唐代以来，泉州经济就出现了向商工为主方向发展的趋势，具有商品经济性质的纺织、制瓷、矿冶、造船等行业已初具规模，其产品“远贩番国”，不远千里来泉州贸易的阿拉伯商人为数甚多，呈现出一派“市井十洲人”的繁荣景象。到五代末，泉州港已成为一个南方的贸易大港。宋元时期，为适应对外贸易发展的需要，泉州的手工业门类更加齐全，技术水平更高，并且形成了一些专业性的生产区域，如矿冶业的“打锡巷”，造船业的“船坊巷”，纺织业的“高锦铺”，造纸业的“纸邦”以及制瓷业的晋江“磁灶”等等。王四达先生认为，无论从就业人数，还是从所创产值，抑或从政府财政收入的角度来看，宋元时期的泉州实际上已形成了以外贸为核心，工商业为主、农业为辅的经济结构，呈现出鲜明的港口经济的特征。

石狮地区作为泉州的一部分，在整个泉州地区形成港口经济的同时，其经济结构也必然地被纳入港口经济之中。不仅如此，由于石狮地区属于沿海突出部，北有泉州湾，南有深沪湾，沿海环列着一系列的港口，加上石狮地区土地贫瘠，严重缺水，更不利于农业经济的发展，其经济结构的外向型当更为明显。据史料记载，宋时，泉州港兴起，蚶江、永宁、祥芝等港澳成为泉州对外通商的重要口岸，朝廷在石湖、永宁建有水寨，富商巨贾，官宦望族陆续迁居其地。北宋政和年间（1111—1117年）僧祖慧募捐巨款在石湖村宝钗山坳建立六胜塔；绍兴年间（1131—1162年），石狮人又在宝盖山